中國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黔川行隨筆之一

7 月，從貴陽出發一路北上，過烏江、赤水、婁山關，再過長江進四川，轉入千里大巴山。

這是一條經典的“紅色線路”，當年的紅軍依託這一帶的林密山高水險躲過圍剿，成功保存了實力，而後逐漸發展壯大，十幾年之後打下了整個江山。

早期的紅軍，就是強烈反抗意志與簡單紅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于巴中市平昌縣的佛頭山，政府修建了一個“中國工農紅軍石刻標語園”，里面收集了上千幅遍布川陝山區且遺迹猶存的石刻紅軍標語。“蘇維埃政府是窮人把發財人推翻了自己選代表建立起來的保護工農利益的政權！”“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參加紅軍好分田！”“紅軍到此地，川陝變蘇俄！”“國民黨是刮民黨！”“赤化全川！”“赤化全球！”等等，就代表了當時的觀念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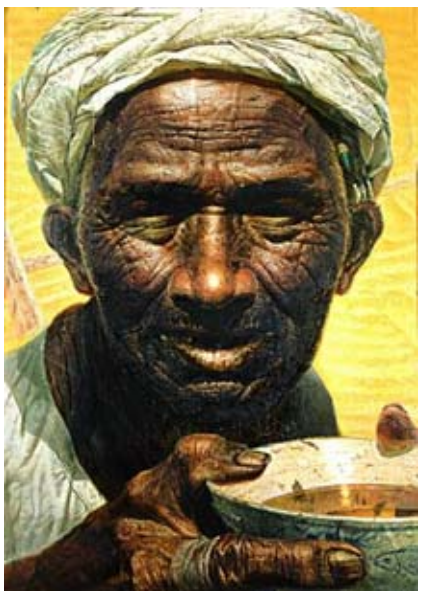
除非瞭解中國的這段歷史，否則今天的人們會大惑不解：如果繼承紅軍的理想，我們今天要推翻所有“發財人”嗎？要繼續輸出革命、實現“赤化全球”的目標嗎？

如果所有這些口號都不再算數，而且還要顛倒過來——不僅不能推翻“發財人”，還要保護、扶持、鼓勵現在這些改叫“民營企業家”的新富人投資興業；不僅不能再咒罵國民黨，還要和當下的台灣藍營握手言歡探討合作和共贏；不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還要動員今天的農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參與土地流轉——那么，爲什么還可以這樣大張旗鼓地紀念甚至繼續宣揚呢？

八十年多前這些充滿煽動性的、激進的左翼運動口號，在當今世上任何一個致力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國家里，都不會公開展示，更不會被執政黨當作光榮傳統加以紀念，即使是左翼政黨如工黨和社民黨也不會，更不用說國家黨和保守黨，那么，爲什么只有中國共産黨可以這樣做？

當年紅色政權要推翻國家政權，代表了民間對國家的反抗，而在紅色政權成爲國家政權之後，又轉爲維護國家政權，代表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同一個政黨，覆蓋了從左到右從紅到藍各個政治光譜，爲什么中國民間社會能夠理解並接受這種路線大掉頭、政策大轉向呢？怎么會當年全力支持鬥爭性的左翼路線，現在又同意各項和諧化的右傾政策呢？

由於這個問題只出現在中國，在現代世界政治史上獨一無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國大地上尋找答案。在大巴山區的新農村建設示範點中，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于大巴山深處的巴中，自古以來因兵家必爭群雄逐鹿而得名，從未以豐饒富庶民衆安康而著稱。此地山區農民的貧窮和苦難，幸得當代油畫家、現任四川美院院長羅中立 1980 年創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親》記録了下來，畫作中的人物原型鄧開選，就是巴中當地的一個普通農民。

千千萬萬的“父親”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窮苦人的化身，他們深重的貧苦，無言地挑戰着紅色政權的合法性，當年紅軍許下的承諾顯然沒有兑現，在社會被國家所整合併爲國家做出犧牲之後，邊緣人群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救助。“父親”的形象，就反映了他們在生存線上自生自滅的慘況。

但同時，《父親》畫作的獲獎，也代表了紅色政權反省自身問題的開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看，就是首先啓動了對於沿海等地“強大”社會的大解放，隨後又開始了國家對於老少邊窮“弱小”社會的大救助。

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幾年落實的。政府提供了從規劃設計、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引進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戶的安置動員、五花八門的惠農補貼等等一整套的“新農村建設”措施，將原本散落在山腰溝底的千百家小農戶，集中到了一個個現代化的新村當中，又通過各種形式的“打造”，將新村變成集旅遊觀光和現代農業爲一體的新型經濟體。

由於力度極大，一個村就達到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資金規模，這些經過“打造”的新村，個個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別墅，村頭像花園，農業成休閑。在平昌縣駟馬鎮一個叫元峰村的新村里，參觀者見到了連城里的公園都自嘆不如的園林化佈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條精緻豪華的“文化長廊”。據村長介紹説，一家農戶靠提供“農家樂”餐飲住宿掙到的錢，僅一個節假日短短幾天就相當于在外打工兩年。

在這種救助中，紅色政權的確是以“窮人救星”的面目出現的，它在規劃設計中代表了科學技術水平，在安置整頓中代表了組織動員能力，在項目引進中代表了信息獲取和資源整合手段，所有這些，都是剛剛從苦難中掙脫出來的貧弱社會完全不具備的，除非依靠政府，沒有任何其他社會力量能夠同時集中調動所有這些資源，完成如此大規模的提陞改造。

在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很忙，要做的事情極多。紅軍在八十年前許下的承諾，現在正由他們逐一兑現，而且超額兑現。在這里，大政府幾乎是必需的，其發展模式就是國進帶動民進，沒有國進就沒有民進。對於這一點，政府是這樣宣講的，農民也是這么理解的，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對抗，只有攜手合作。

當然，紅色政權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繼承者們可以欣然面對當年的紅軍標語而無需迴避。其中的歷史邏輯就是：窮苦人原本是毫無希望的，當年的“發財人”和國民黨不能帶給他們好日子，只有紅色政權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終于降臨，儘管晚了很多年，但總算來了，窮苦人當年支援紅軍，並沒有白白犧牲；正是紅色政權保障了國家的人民性質，人民國家通過大規模救助貧弱社會，讓窮苦人過上好日子。

就這樣，在巴中這樣的地區，八十年來的紅色故事説圓了，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完成了自洽。

當然，這只是對老少邊窮等地的貧弱社會而言，以中國幅員之大、差異之大，不可能是同一個歷史邏輯。在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富裕地區，中國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又是什么，容後再談。

文揚 2014 年 7 月 18 日

新型大國關係“新”在何處

穆可 撰寫

多維消息在最近幾年中美交流的場合中，“新型大國關係”是最常被提到的概念，但是從目前中美交流的情況來看，“新型大國關係”更像是一場相聲表演，中國就是那逗哏的一方，不停地對美國説“我們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而美國則是那捧哏的一方，儘管不知道中國説的“新型大國關係”到底是什么，但是也十分配合的表示支持。遙想山姆大叔從北美十三州起家，先是在美洲稱王，後是在歐洲稱霸，接着就是全球橫行。想當年超越英國，打敗德國，拖垮蘇聯，從來沒有哪一個挑戰者或者被挑戰者説要建立一種“新型關係”。習慣了鬥爭的現實主義理論的美國人雖然附和了“新型大國關係”，但是卻難以理解。或許中國政府的外交人員自己也不甚明瞭，因爲歷史與理論都沒有給他們一個可以參照的範本。

2010 年 5 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提出，中美應“開創全球化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新型大國關係”首次出現在中美外交場合，但是由於沒有更高一級的加持，“新型大國關係”並沒有引起重視。2011 年 1 月，胡錦濤訪美期間，中美兩國元首就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達成共識；2012 年 2 月，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美，就如何落實兩國元首共識，進一步提出要構建“前無古人，但後啓來者”的新型大國關係倡議。三個月後，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題爲《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致辭。由此“新型大國關係”正式成爲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

雖然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單單是指中美關係，但是在中美交流的重要場合，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不斷得到豐富，毫無疑問，建設新型大國關係，中美關係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給予了“新型大國關係”足夠的重視，經歷了二戰以及冷戰的美國，也希望能重新界定後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關係。希拉里·克林頓曾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美國海軍學院先後發表兩次重要講話，同樣提到“中國不是蘇聯”、“中美不應走向冷戰”，中美要建立一種“在競爭與合作中實現最佳平衡”的大國關係，“而這是沒有先例可循的”。

不過，雖然中國天天講新型大國關係，美國也隨時在附和，但是兩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具體內容尚沒有清晰的共識，中國希望美國不要阻礙中國的崛起，而美國則是希望中國不要挑戰美國的地位。兩國都有各自的追求，因爲對新型大國關係“新”在何處沒有達成共識，所以才導致了兩國各自的解讀。

新型大國關係既然是“新型”，那么當然是相對於舊大國關係而言的。舊的大國關係是什么樣的呢，一個著名的歷史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解釋。“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説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爲，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

歷史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比比皆是，雅典與斯巴達的廝殺，英法在歐洲大陸的霸權爭奪，英德全球地位競爭，美蘇爭霸。美蘇爭霸雖然沒有進入戰爭，但是冷戰的形式也説明瞭美蘇關係的緊張。

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進程加快，現在的世界已經連成一體，兩個大國之間如果發生戰爭，那影響絶對是全球性的，尤其是中美這樣的國家，戰爭或許即意味着世界的毀滅。所以兩國必須認眞考慮如何避免戰爭，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新型大國關係給了兩國一個很好的嘗試。

既然是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那么必然帶有濃厚的中國政治文化的色彩在里面。中國是一個十分注重歷史的國家，歷朝歷代都有修史的傳統，所以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祖宗法度重要性不亞于當朝皇帝的敕令，所以尊重前人前朝是中國當權者必備的政治素養。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脫胎于中國的政治現實當中，自然也無法改變政治文化當中的中國傳統，所以中共特別強調代際的傳承以及尊重老人。就像鄧小平被毛澤東打壓多年，但是依然保持對毛澤東的尊重，“三分過七分功”的評價維持了毛澤東開國領袖的權威。

而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三代均沒有革命功績作爲掌握國家權力保障，所以傳承與尊重體現得更爲明顯。胡錦濤雖然受制于“老人干政”，但是依然沒有利用當政者的權力對付前任，而等到習近平上台之後，儘管黨政軍權力集于一身，但是在反腐以及黨建等關乎共産黨命運的問題上依然會徵求老人們的意見。而且習近平還時不時允許老人們出鏡，要么是游山玩水中關心社會民生，要么是與外國首腦會面中助力外交發展，總之對待老人，習近平不是權斗式的打壓，而是尊重。

而目前中美關係也像是一種權力交接的過程，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逆轉的，超越美國也是指日可待的，不僅中國人對此有清楚的認識，美國人也需要客觀的對待這樣一個過程。美國人需要明白，新型大國關係不僅僅是指現階段的中美關係，更是代表着中國超越美國之後的中美關係。

就如同中國政治文化中尊重前代領導的傳統，中國超越美國並不意味着美國必然會受到中國的打壓，不會像英美那樣，英國聽命于美國，也不會像美俄那樣，始終無法建立互信。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涵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國需要美國尊重中國的利益，中國當然也會尊重美國的利益，中美地位的互換並不意味着中美關係的變化。相互尊重依然會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依照中國的政治傳統，即便未來中國會超越美國，中國也會尊重美國的意見，也許在某些問題上也會徵求美國的看法和建議，從而實現某種意義上的中美共治。

但是中美共治並非是中美聯合統治世界，而是作爲大國對世界安全的義務和責任，中國依然會堅守不干涉的原則，堅持國家部分大小一律平等。也許這正是美國所不適應的地方，因爲美國的政治字典中缺乏公平對待每一個國家的字眼，所以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問題上，美國的調調無法跟上中國的調調，這是因爲美國還不瞭解中國，不瞭解中國的政治傳統，所以對“新型大國關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解，而且美國還對中國挑戰自身的地位感到擔憂。

當然所謂的挑戰僅僅只是美國作爲守成大國的看法，實際上中國的發展並不是以超越美國爲目標的，而僅僅只是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要求，超越美國僅僅只是客觀上的效果，就像中國從來沒有制定超越日本的戰略一樣。中國不是一個通過打壓其他國家獲得或者維護自身地位的一個國家，而是通過自己的發展自然而然的取得某一種地位，這種地位並不是中國自封的，而是因爲中國的發展而獲得世界認可的。正因爲如此，中國才能客觀的看待老大和老二的關係，正所謂“順，不妄喜；逆，不惶餒”，當老大不會頤指氣使，沾沾自喜，當老二當然也不會捶胸頓足，惶恐不安。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一種正確處理老大與老二的關係的方式，美國需要的是瞭解其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智慧，而不僅僅只是一知半解的附和。

(穆可 撰寫)